

THE CHOSEN

被选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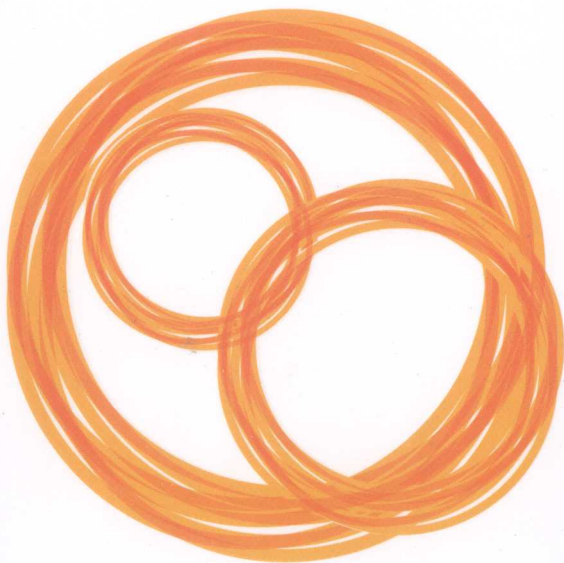
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教育社会学的旷世经典

美国大学三巨头：一个世纪的招生故事

每个读完此书的人，对美国大学招生甚至对美国的看法必将得到刷新



[美] 杰罗姆·卡拉贝尔 / 著 谢爱磊 周晟 柳琳 等 / 译

THE
CHOSEN

被选中的

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美] 杰罗姆·卡拉贝尔 / 著

谢爱磊 周晟 柳琳 等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美)杰罗姆·卡拉贝尔著;谢爱磊,周晟,柳琳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300-16743-5

I. ①被… II. ①杰… ②谢… III. ①留学教育—概况—美国②高等学校—介绍—美国 IV. ①G649.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7903 号

Copyright © 2005 by Jerome Karabel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

[美] 杰罗姆·卡拉贝尔 著 谢爱磊 周晟 柳琳 等译

Beixuanzhongd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5 mm×250 mm 16 开本

印 张 48 插页 2

字 数 885 000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美国媒体及名家

各方盛赞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引爆点》作者

《被选中的》文笔优美，研究严谨，它将永远改变美国人对精英教育的理解。

《高等教育记事报》

磨砺数十年的大将之作，《被选中的》精彩地剖析了美国名校“三巨头”在广泛选取新生过程中（歧视性）的渊源。

《Slate 杂志》 美国知名网络杂志

史诗般宏大，且表述严谨。

《圣荷西水星报》

非常引人入胜……是一部不朽的学术著作。

《经济学人》

博大且引人入胜。

《纽约书评》

一项有趣的研究，它揭示了在整个 20 世纪，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是如何决定录取谁和不录取谁的。

《美国展望》

研究细致，论证敏锐……且非常引人入胜。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震撼人心！

《亚特兰大月刊》

卡拉贝尔睿智且入时地讲述了他的故事……卡拉贝尔极富启发性且不动声色地对精英学校里的阶层多样化进行了批判……而最新颖也最重要的是，卡拉贝尔在全书中始终坚持要让读者明白他所说的“贤能主义的阴暗面”。

《达拉斯晨报》

情节交错，令人入迷——人物阵容强大到足以令所有小说家嫉妒……而且极具说服力。

《黑人高等教育期刊》

分析发人深省……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著作。它构筑在精确的历史感、严谨的研究以及新颖的洞见之上，展示了高等教育如何影响以及反映整个社会。《被选中的》无疑是一部值得好好鉴赏的著作。

《犹太评论》

完整可靠……（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美国一个世纪的历史。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横扫一个世纪的反思。

《纽约客》

非常出色。

《图书馆期刊》

一项很强大的研究……本书是那些对美国贤能主义思想有研究兴趣，并相信社会流动的引擎是基于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这一观点的人的必读读物。

《评论》

出色且极具权威的研究。

《纽约太阳报》

这是一部尼采式的知识系谱学，它揭示了学生如何申请以及被选入大多数精英大学——这一我们习以为常的过程从来都不是没有时代烙印或公正无私的……（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即在美国那些提供高等教育的地方所存在的蓄

意的偏执。

《亨廷顿新闻网》

这是一场盛宴，对任何致力于研究这个自称平等主义国家之文化的学者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高校情报》

卡拉贝尔果然是有故事要讲……它（的确每一个方面）都有吸引人的主题。本书的标题本身也让人有种冷不防的感觉……不过卡拉贝尔却把矛头指向了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体制本身——他的指责如此隐晦，研究如此细腻，让人丝毫不觉得具有争议性。

《艺术与文学杂志》

一部超凡的著作，研究深刻全面，论述令人信服。

杰弗里·卡伯瑟维斯 《守护者》作者

非常权威……堪称 20 世纪关于高校本科生招生最全面最透彻的研究。

Kelvin Boyle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奖作品《正义之弧》作者

太棒了……其对美国三所最高学府的政治和特权的论述相当精彩。

安东尼·刘易斯 《基甸的号角》作者

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隐秘历史。

拉尼·吉尼尔 哈佛法学院贝内特·博斯金讲座教授

这是对精英学校疯狂的招生制度率直且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很多时候优点其实常常作为权利的仆从。

克里斯托弗·埃弗里 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既有趣又权威……这样一部研究严谨、可读性强且兴趣广泛的著作实在不可多见。

小亚瑟·施莱辛格 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一千日》作者

这是一项激动人心的美国文化史研究。

托德·吉特林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和社会学教授，《六十年代》作者

一部调查性社会学的力作……任何想了解美国不断演变的制度基础的人都不得不读《被选中的》。你会被过去的偏执所震撼，并接受卡拉贝尔的挑战去反思贤能主义的理想。

贾斯汀·卡普兰 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克莱门斯先生和马克·吐温》作者

睿智并公正地论述了一个棘手且重要的议题。

序 言

有人说过，作家的使命就在于化陌生为熟悉，或者化熟悉为陌生。在今日之美国，可能很难再会有什么传统会比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盛事让人们更为熟悉了。我们的顶尖大学在数以万计的申请者中从容挑选，以决定有哪些幸运儿能够中选。当然，最终胜出的人只能是少数。我们熟悉的情况还不止于此，大学招生过程的特色我们兴许也能倒背如流——需要推荐信、面试、强调课外活动还有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 SAT），假如是运动员或者是校友子弟还能获得加分，当然对一些非常主观的品质诸如“品性”、“人格”以及“领导力”，学校更是尤为重视——时至今日，所有这些都已理所当然。

不过，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比较的视野来看，现今美国的一流大学在招生事务上的做法又都是让人感到异常陌生的。^[1]尤其是当我们试图向外国人——例如，法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或者中国人——解释为什么会踢球和父母是校友等因素居然事关学生是否能够在顶尖大学获得一席之地时，这种陌生感可能更是油然而生。这时，你也许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做法是何等独特。解释这些奇怪的做法源自何处，弄清它们为何又能够如此经久不变，乃是作者写作此书的首要目的。

同其他国家的大部分顶尖大学一样，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本书研究的核心——在它们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以学术标准为基础来录取新生的。但是，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情况有所改变，学校不再依赖传统的学术要求来剔除那些确实“不受欢迎”的学生。此时，当权者们很清楚，假如只依靠学业表现来选拔新生，那么校园中犹太裔学生的数量将会不断增长（这些犹太裔学生的家庭大部分来自东欧）。其实，在全美国限制移民运动达到顶峰时，这种增长已经相当明显。然而，对于那些主持“三巨头”大学校务（那个时候，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称为三巨头大学）的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绅士们而言，这种现象显

然无法让人接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发明了一套全新的招生体系。这套体系既背离他们自身的传统，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顶尖大学的做法有着实质性差异。不过，也正是这套体系——尽管经历过一些细枝末节的修补——一直延续至今。

新系统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便是，它完全摒弃了将学业能力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的做法。在三巨头大学（还有其他那些顶尖的私立院校，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达特茅斯学院），尽管教师们还普遍认为学生的录取应当视乎其学业表现，但是领导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知道，一旦学生的录取与否完全依赖某一单一标准——尤其是可量化的标准，例如学业是否优秀——那么，他们便再无法将录取权控制在手中。为了维护自身机构的利益，三巨头大学的校长们意欲牢牢掌握录取学生的权力，这样他们就能不费周章地将大捐赠者愚钝的子女录取进自己的学校，将那些虽有天才却未经雕琢的移民子女拒之门外。如若不然，那些拥有高贵血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后裔——未来的领导者和捐赠者——则极有可能弃之而去，另择良木。当然，他们明白，如欲将录取学生的权力掌握在手，就不能采用单凭学业成就来录取学生的选拔政策。

传统上依据考试成绩录取新生的做法让三巨头大学的领导者们开始有些招架不住，因为旧的系统开始让“错误”的学生涌入校园。为此，三巨头大学的领导者着手设计了一套新的录取体系，按照这一体系，他们可以从容控制谁可以被录取，谁又会被拒之门外。新体系的基石是自由量度权与模糊性。所谓自由量度权，就是三巨头大学的“守门人”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所谓模糊性，就是他们可以随意行事，并且不受任何公众监督。旧的录取体系完全依赖考试录取学生，到底能录取到谁，守门人常常无法预料；与之相比，新的录取体系则预留了很多可供操作的空间，大学的管理者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对其加以调整。而这种自由调整的能力也预示着一套新的录取体系已经建立，这套新的体系信奉一条“录取的铁律”：只有在学生录取的政策符合学校的自身利益时，一所大学才有可能维持这些政策不变。^[2]

新录取政策的核心要素是所谓的“品性”——一种被认为犹太人少有，而被上层阶级新教徒广泛拥有的品质。对于那些领导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的绅士们而言，“品性”就是道德观和生活方式的简称。它难以名状，只有那些拥有这种品质的人才能判断、识别它。在录取学生时，他们开始强调那些模棱两可的主观品质，例如“刚毅”、“人格”、“领导力”；结果，三巨头大学的领导者们获得了高度的录取决定权——他们可以自由决定该录取谁，又该拒绝谁，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完全主观的判断之上。

20 世纪 20 年代,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人们已经开始重新定义何谓“才能”。而三巨头大学录取标准的这种转变——从客观的学术标准向主观的非学术标准的转向——只能算是这场社会运动中的一个部分。尽管这种转变的动机意在惠及某一特殊群体并排斥另一群体(其实际结果也是如此),它的展开却被美化为普世价值实践的一个部分——它是以机会平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社会必然的诉求,它是一个依据才能而非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国度(不像欧洲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应当的价值主张。^[3]对于三巨头大学的领导者们而言,转变的核心在于录取过程的设计。对于别人,也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录取过程的设计应当使人看起来觉得它是公正的。而“品性”一词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将新体系合法化的重要依据。

正因为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在美国精英人群中独占鳌头,因此,任何试图改变这三者录取规则的尝试都影响深远。^[4](有史记录的 105 年中有 44 年是三巨头大学的毕业生在执掌白宫。到 2008 年,这一数字会增至 47,因为小布什曾是耶鲁一员)^[5]在最近几十年,进入这三所大学以及其他顶尖大学的竞争愈演愈烈,公众对这些大学几近痴迷,而此竟滋生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培训公司到辅导用书,从私人辅导到夏令营,从软件包到动辄收费高达 29 000 美元/每年的私人咨询顾问,都是这条绵延的产业链上的一个个环节。^[6]在这条产业链之后,是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大批的研究也不断对其加以证明——进入一所“权威”的大学是一项对后半生至关重要的投资。^[7]这种对大学教育日益痴迷的态度也并非全然非理性。在一个文凭的获得与直接的财产继承并驾齐驱、并成为代际间优势地位传递的重要工具的社会,这种态度更可理解。在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任何能够带来一点竞争优势的工具都表现出强烈的欲望。^[8]

也正是因为任何改变我们顶尖大学录取规则的尝试都影响深远,所以每一次关于录取标准的重新定义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每次争论的核心都是究竟什么可以被称之为“才能”——一种大部分美国人视之为决定其子女是否能够被大学录取的品质。然而吊诡的是,尽管美国人一般都认为(至少一般公众都这样认为),在美国,应当是“才能”,而不是出身决定教育机会的分配,但是,他们对何谓“才能”却没有一致的定义。实际上,“才能”一词根本就没有中性的定义。无论如何定义,它都只会对一些群体有益,同时不利于另一部分群体。

在本书中,我们将对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自 20 世纪初以来在录取学生时所采纳的“才能”的定义进行研究,我们将力图解释为什么录取的标准会不断改变,谁又从这历次改变中获益,谁又是这历次变迁的牺牲品,而所有这些对这个国家而

言又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将不可避免地与此一时期美国的宏观历史交织相连——美国从一个由少数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人统治的国家逐渐变成一个包容的、不断地吸收接纳原先遭到排斥的人（包括犹太人、黑人和妇女）共同参与治理的国家。

不过，这个故事也同样是一个关于既有社会秩序——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如何得以维持的故事。在 20 世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巨头大学出现过不少“极具远见”的校长，对此不平等社会秩序的维持，他们可谓“居功至伟”。这些校长们的办法之一便是，一旦出现要求更多条件平等的激进的社会运动来挑战美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关于机会平等的意识形态时，他们便使用录取政策来推动个体的流动。^[9]

在机会的平等（亦即个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受制于其社会出身或者先赋特征，例如性别与种族）和条件的平等（财富、权力和地位之间的不平等需要尽力维持在最小的限度）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我们叙述 20 世纪三巨头大学历史的一条线索，这也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框架。^[10]在这个意义上，贤能主义的社会——也就是，机会的平等占据主导地位，最有“才能”的人统治社会——不是对更为平等的社会的一种对等描述，而是一种替代。^[11]

在美国，一直以来，贤能主义的原则比条件的平等原则更受大众的支持。但是，在任何社会，“才能”一词的定义从来表达的都是统治群体的理念和利益，不论是在当今美国，还是在遥远的古希腊，都不外如是。^[12]在勇士社会，“才能”一词所指为战场上所需的“勇气”和“技能”；而在宗教社会，“才能”一词所指则为对经文的掌握；在共产主义社会（例如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才能”一词所指则为“又红（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度）又专”。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三巨头大学对“才能”一词的定义历经数次转变。在 20 世纪初，“才能”一词所指基本上与学术有关，它主要通过对传统课程（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掌握程度来衡量。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美国加强对移民的限制，这一含义逐渐地让位于所谓的“全人”——健康的体魄，以及优越的家庭背景。（按照这一定义）所谓理想的本科生就是指那些能够花一点时间在俱乐部或者搞点活动的学生。那些花了大量时间端坐在课桌之前苦读的学生，就要被称为“书虫”甚或“书呆子”了。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由于冷战和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刺激，美国人开始担心所谓的“人才流失”问题。所谓的“全人”也开始让位于智力上的天赋（主要是指能够在 SAT 中获得高分，同时还能在一种或者多种课外活动中表现出

色)。正是在这段时间,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自己的大作《贤能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书中引入了“贤能主义”(精英治国或贤能主义)一词,这一词汇随之进入大众语汇。这一词汇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流动不依赖于他或她的社会出身,相反,其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天分与成就。^[13]对于像耶鲁校友小威廉姆·F·巴克莱(William F. Buckley Jr.,他认为录取新生时理应给予校友子弟以优先考虑,而三巨头大学在维持既有的精英秩序上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样的人来说,贤能主义不啻是一种威胁。但是,对于那些倾慕法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日本东京大学录取模式、主张只依据测验和考试成绩录取新生的人来说,杨的文章不啻是一曲战斗的号角。不过,即便是杨自己,“贤能主义”一词——不论是学术人员所倾向的那种含义,还是其他更为形象和客观的含义,像三巨头大学的管理者所看重的所谓课外活动和像“品性”、“领导力”等这类个人品质——本身也是问题多多。它实际上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贫困和条件平等问题的关注转移到不切实际的没有限制的社会流动诉求上来。

杨对贤能主义的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更为激进的社会环境中方觅得回应。这一时期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最终再次重塑了“才能”一词的含义。在三巨头大学的录取政策中,有了骤然的文化转向,所谓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价值观逐渐获得中心地位。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扶持有色人种的赞助性行动得以开始,女性入学的障碍也最终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从上述论述来看,三巨头大学录取政策变化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围绕“才能”一词的定义不断斗争的历史。不过,在这些不断的变化和反复争夺的背后,有一条基本的规律可循:“才能”一词的定义随着社会以及社会各个群体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而发生变化。这也导出本书的一个核心论断:“才能”一词的定义是动态的,它倾向于反映那些有权力将自身的文化理念强加给整个社会的那些人的价值观和利益。

不过,我们说“才能”一词的定义大体上反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利益,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如此。正因为“才能”一词的定义是如此重要,它经常被人们争论,其定义权亦被不断地争夺、改写。在政治和社会出现动荡的时期,那些在边缘的群体完全有可能对大学入学政策施加有力的影响,迫使其改弦易辙,反映自身的世界观和利益。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生过,在这一动荡时期,“才能”和“多元化”被联系在一起,赞助性行动也得以开始实施。三巨头大学录取政策变化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精英统治的历史,更是一部关于那些被统治的群体如何反抗的历史。并且,由于机会的平等这种意识形态之

于美国社会秩序合法性的头等意义，大学更是处在历次运动的中心。这些运动要求更为包容的社会政策，要求将美国人关于平等的最高理想付诸实践。

录取的决定是由教育者所做，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政治性。正如格伦·洛瑞（Glen Loury）敏锐地观察到的，精英大学并不是“一块净土，在这里，权力的获得及其影响力并不遵循理性的原则”^[14]。正如三巨头大学历史上一些最善投机的招生主管在一些场合所坦言的那样：新生名额的分配是一项稀缺资源分配的过程，其本身充满政治性，必须调和各利益群体（像运动员主管部门、各学院）以及外部团体（例如校友会、重要的生源学校以及少数民族群体）的需要——他们都想分一杯羹。^[15]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包括定义录取准则，应当给予哪些群体（例如，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而非弱势白人群体）以特殊照顾的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从这点看来，录取政策就像一个不同的群体之间讨价还价的大拼盘，每个群体都想决定录取标准、影响实际的选拔过程，从而使最终的结果有利于自己。^[16]

透过对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三校录取政策变化的历史叙述，我们能一察这些政策所透露出的社会排斥倾向。我们也能管中窥豹，透过这些去洞悉 20 世纪美国社会所发生的那些主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美国作为帝国一极的崛起、限制移民运动、反犹太人运动、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原子弹爆炸、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冷战、人权运动、女权运动、亚裔美国人的兴起和市场道德的胜利。所有这些都可通过几位人士的故事来一探其中堂奥。这几位曾对美国的高等教育留下永久的影响，也将在我们的叙事中占据大量篇章。他们中有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格罗顿中学（1884—1940）那位严苛而又高贵的校长。他将英国上层社会绅士教育的理念引入美国教育，他也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终生导师；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02 年至 1910 年间他任职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曾尝试废除普林斯顿的饮食俱乐部体系，不过，却最终归于失败。但是，此举却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对这所大学的看法，这也为他人主白宫开辟了道路。

在皮博迪和威尔逊之外，我们还要介绍的两位历史人物是曾为哈佛大学校长的查理斯·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 [1869—1909]）和劳伦斯·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 [1909—1933]）。来自波士顿布莱明望族（Boston Brahmin）的这两位管理者领导了美国最古老也是最富有的大学超过 60 年之久。尽管他们都来自贵族，两人在个性和政治观点上却背道而驰。同属新教精英，一个代表的是进步的、包容的一派，而另一个代表的却是保守、排外的一派。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们曾为哈佛大学对有宗教背景的学生的招生名额有过激烈的斗争。较开明的埃利奥特，

其时已届 90 高龄，他强烈反对洛厄尔限制犹太裔学生入学的计划，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场史诗般的战斗是三巨头大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片段之一。

自大萧条之后直至 20 世纪中叶及其后，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也是我们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是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这位聪慧过人的化学家于洛厄尔之后任职哈佛大学校长（1933—1953）。尽管传统上人们一直视科南特为一个有贤能主义倾向的人，但实际上，他要远为人们认识的复杂。他设计的精英大学的录取体系有力地调和了两种倾向——埃利奥特的机会平等取向以及洛厄尔竭力想要维护的哈佛大学的那种盎格鲁-撒克逊气质。在科南特时期，哈佛大学的录取政策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比较保守。不过吊诡的是，科南特本人的作品却并不如此。从不少方面看来，他的作品甚至非常激进。例如，他大力抨击“有钱人的贵族政治”，呼吁落实贤能主义的原则——尽管落实这一原则意味着优势群体的子女可能向下层社会流动。不过，假如我们结合当时的大萧条背景，这种观点也可得以理解：当时国内和国外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已经威胁到了这一体系的生存，而科南特所描述的通过教育——包括进入国家最顶尖的私立大学——来实现社会流动的社会图景，不正算是对当时日益增长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呼声的一种反制？^[17]

20 世纪 60 年代是另一个既有秩序受到激烈挑战的年代。此一时期，耶鲁大学自信满满的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 [1963—1977]）接过科南特手中的旗帜。这位帅气的出身贵族的校长，其先祖是搭乘“五月花”号来美洲的第一批人之一。布鲁斯特是新教徒中进步一翼的典范，他在耶鲁所施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可算三巨头大学历史上最为激进的方案。^[18]但是，在本质上，布鲁斯特与科南特并无区别——他们所做的努力都在于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也都认为既有秩序的合法性应当部分地建基于其对才能决定地位这一原则的包容姿态。与科南特一样，布鲁斯特同样认识到了新教上层人士对“必要的改革”的反对——不论是对大学录取政策的改革还是更广范围内的社会改革——已经给自由市场体系带来了生存危机。

要叙述清楚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招生故事，当然得讨论一下那些曾经主管实际招生事务的人。20 世纪 20 年代初，各校开始设立招生办公室。自此时起，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三位主管录取事务的主任对他们各自的机构乃至他们全国的同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三位分别是：普林斯顿的拉德克利夫·赫尔曼斯（Radcliffe Heermance [1922—1950]）、哈佛的威尔伯·本德（Wilbur Bender [1952—1960]），以及耶鲁的英斯利·克拉克（R. Inslee [“Inky”] Clark [1965—1970]）。这三者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令人敬畏的赫尔曼斯。在不断地完善技术排斥那些“不受

欢迎的学生”方面，他做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他给每一届耶鲁的新生都打上了自己鲜明的个人印记。本德是一位来自印第安纳的门诺派教徒（Mennonite，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徒新派，反对婴儿洗礼，服兵役等，主张生活俭朴——编者注），由柯南特在校长任职的末期任命。他可能是所有任职类似岗位者中经历最为丰富多彩的一位了。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他对上层社会预备学校的学生（男生）情有独钟，认为这些孩子都是“绅士”。本德也是贤能主义思潮的牺牲品，其时，由于苏联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的刺激，教员们都全力号召，期望推进按能力招生的制度。不过，在卸任之际，本德还是不忘写下洋洋洒洒的文字，对只按学业成就标准招生的做法提出严厉的批判。这些批判，时至今日，影响仍在。克拉克这位曾经的“骷髅会”成员——曾经的耶鲁本科生，典型的耶鲁人——看起来绝非能够带来激进的变革。然而，正是在他的主持下，耶鲁的招生制度有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革措施甚至招致耶鲁校友大规模的反对。正是这三人，赫尔曼斯、本德以及克拉克，其观点完整地代表了从左到右的政治谱系，他们的实践亦反映了三巨头大学面临招生事务的困境时有何不同的应对。

通过对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在20世纪转变历程的梳理，不难看出，这三者录取政策的变化，其首要的目的在于，在美国高度分层的高等教育系统中维持、甚或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地位。^[19]表面上，这三人的政策通常看起来都极具前瞻性，包含了对至高社会理念的追求，但实际上，它们是非常保守的。更让人惊讶的是，三巨头大学时常对自身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至高地位有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它们竭力想要维持自己和来自优势社会地位的人群间的联系。有时，它们的确会改变自己，尤其是当如下两种情况发生时：现行的政策已经威胁到了自身的利益（保证自身的竞争力是最重要的）；现行的政策已经威胁到了既有的大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它们深知，自身也是这社会秩序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三巨头大学竭尽全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此，能够起到最好诠释作用的可能要算耶鲁和普林斯顿最终决定录取女生的事例了。关于它们为何要录取女生，我们不太可能从它们宣称的对机会平等的追求中找到多少解释；相反，倒是可以从另一种认识中一窥其中玄机：它们意识到假如只招男性，它们就有可能招不到“最好的男生”。20世纪60年代赞助性行动的实施也是一个绝佳的类似事例。同样，我们不太可能从三巨头大学对人权运动（请注意，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开始兴起）的崇高追求中寻得多少它们为什么实施赞助性行动的解释，结合1965年至1968年发生的大规模种族骚乱，倒是能从三巨头大学对社会分裂的忌惮中找到其中的部分原因。确切地说，那些掌管三巨头大学事务的人，是在严格执行自身的理念，与此同

时，他们亦须承担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要理解他们的行为，不应依据他们所公开宣称的各种原则。他们所做的，与大型公司的头头所做的并无多大的不同——他们都是在规避风险，首要的任务都在于在一个高度竞争性的环境中捍卫自身所在机构的地位。

本书所述之故事，其基本证据来自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的档案。在研究三巨头大学的学生录取以及相应的社会排斥现象时，我们对文献进行了深度发掘——它们中的不少还属首次披露。这些文献中，有些是重要的管理者和招生事务管理者的通信；有些是内部的备忘录；有些是招生办公室的手册；有些是校友访谈；有些则是内部数据研究；还有招生委员会、教授会与学校理事的会议记录。我们还使用了每年各校的年度招生报告（哈佛自1911年刊发，耶鲁自1912年，普林斯顿自1922年）。对我们而言，特别有用的还有各个学院的年度招生报告，这些报告中还包含了用来辅助教授会做决定的背景性论文。此外，我们还使用了学生报、校友杂志（包括耶鲁和普林斯顿反对派保守的校友杂志），还有各色管理者刊发的文字。为了收集传记类型的信息和统计类数据，我还查阅了新生档案、年鉴以及联欢会的报告。我们还有幸获得了美国教育署人权办公室的相关资料，他们所提供的资料为该机构在1988年至1990年这两年针对对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申请者的指控所作的调查。所有这些材料对于我们了解大学录取的实际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哪些要素最终决定大学招生部门录取或者拒绝某个申请者）都大有裨益。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基本上涵盖三分之一世纪的内容。第一部分的故事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结束于大萧条早期。这部分叙述的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大学录取体系的诞生。但是，假如我们对此前基于考试的录取体系和对新录取体系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群体的理念缺乏应有的认识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无法掌握这一新体系的特征。新的体系由新教上层社会所推动，意在应付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新体系极大地背离了原先传统的、基于考试的选拔实践。第一部分叙述了这一新的体系如何形成，谁钟情于它，谁反对它，它为何以其特殊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第二部分的故事始于1933年——这一年，科南特入主哈佛——结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这一部分，我们解释了旨在保护新教精英既得特权的录取体系是如何有了新的变化，渐渐地改变了原初的模样。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一些较大规模的改革——例如，基于能力颁发的奖学金日益增加，SAT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对犹太裔和公立学校学生的歧视开始减少，机会平等以及寻找“天才”的理念开始变为高校官方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这些亦使得人们开始相信，在哈佛、耶鲁以及普

林斯顿，“贤能主义”的理念正日益受到重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哈佛实行了其没有公之于众的一项录取政策——将新生中“有才智的学生”的规模限制在新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下，与此同时，它还公开地宣称将要施行所谓的“快乐的后四分之一”（happy bottom quarter）原则，即将相当一部分新生名额保留给那些在学业上并不优秀但是在其他某些方面表现出色的学生。在第二部分故事结尾的这一时期，通过 SAT 考试进入三巨头大学并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在数目上已经有了非常快的增长。不过，在此时，学生中人数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还是白人，在耶鲁和普林斯顿，还需另加一限定词——男性。

在第三部分，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并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历史分期之初，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大量涌现。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三巨头大学就调整了其招生政策，开始实行赞助性行动计划，并且很快又开始接受男女混合教育——在招生时不再考虑性别因素。这些改变是如此之快，以至竟然引起激烈的反对。例如在耶鲁和普林斯顿，两校的校友对这些变革做出了反抗。在第三部分，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各校在录取政策上的变化会发生，也解释了为何任何尝试扭转这些变革的尝试最终都会归于失败。在这部分的结尾，我们对三巨头大学最近几年出现的发展做了一些讨论——这些发展主要有：对歧视亚裔的指控；赞助性行动实施过程中的持续矛盾冲突，以及关于在录取过程中应当给予家族忠诚度（legacy status，亦即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曾就读该校——译者注）和运动能力多少权重；努力提升来自工人和贫困家庭背景的学生入学率。所有这些发展都表明，在今天，围绕“才能”一词定义的斗争像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样，依然激烈。

现今的录取政策已经施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所有的故事都开始于 1900 年，这一年，E·迪格比·巴尔策尔（E. Digby Baltzell）写道：“英裔美国人——一个白种盎格鲁-撒克逊（WASP）阶层……开始统治世界。”^[20]

【注释】

[1] 在社会科学中，学者好似有责任化陌生为熟悉，化熟悉为陌生。这种理念对人类学的影响尤为深远，可从不少人的作品中一窥其端倪。具体可参见：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Melford Spiro, “On the Strange and Familiar in Recent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in *Cultural Psychology: Essays 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 ed. James W. Stigler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pp.47-61;